

序 章

1. 问题的设定

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在观点上有很大的起伏变化。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不能只将其简单地看成是日本社会对中国认识的深化，而应该认识到这是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社会发展及人们的意识发生变化的结果。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地位的变化，最终导致了日本在与中国发生关系时态度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考察战后日本中国认识的变迁过程时，研究不同时期的社会舆论，也许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同时期的社会舆论都带有特定的时代特征。社会舆论是公众的言论和意见，是一定时期内人们共有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具体体现。作为流通和表达的方式，社会舆论最初形成于街谈巷议，最后以一些较为恒定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作为研究舆论的方法，这里主要以舆论调查、报刊等出版物作为考察对象。

尽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其客观性，但从历史上来看，人文社会科学在问题意识和观点的形成上都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与社会舆论相互影响的态势。除舆论调查和报刊等媒体外，这里所考察的另外一个对象是以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界。学界的研究对战后日本中国认识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此外，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将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化有关联的日本的记者、政治家或经济界人士的观点也纳入了进来，因为只有通过分析这种社会舆论的变化才能真正把握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化。本书所要尝试的就是要通过对一些常见的社会舆论和学界的中国研究的解析，来勾勒出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形成和变迁的过程。

这种认识在研究日本的中国认识时是至关重要的。本书拟从战后日本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舆论、思想文化的大环境中来把握日本的中国认识，同时亦将通过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变化，勾勒出日本社会思想文化的一般特征。作为具体的事例分析，本书拟从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中国近代化的模式、传统文化等视角来分析日本人的中国认识的变迁过程。作为论证方法，是在各章中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舆论及有代表性的研究，探讨舆论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的形成背景，以具体的事例来分析中国观的变迁过程。并通过比较论证，考察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以及社会舆论与学术研究的相互影响。

考察日本的中国认识，自然离不开论及作为其参照系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有关研究状况，但是，在这里主要是以日本为考察对象，所以为保持论点的一致性，使研究焦点更加明确，这里将尽可能少涉及国内及其他国家的研究，在必要的情况下，只对美国的研究作些介绍。

有必要指出的是，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日本的中国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各国都有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主要是由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中国认识是历史上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发展和延续，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也就有必要把历史上日本人的中国观与其对中国的研究放在前面加以探讨。

2. 日本中国学的历史

其实 中国学这一用语在战前是不存在的 在日本历史上 研究中国的学问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为汉学和‘支那学’。在战前，日本把中国称之为‘支那’在日本 中国作为一个国名出现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事。由于日本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称中国为‘支那’自然在战前今日的中国学也称之为‘支那学’。^①“支那

^① 由于侧重点不同 人们对汉学“支那学”和中国学的解释也略有不同。《日本国语大辞典》(小学馆,1980年)和《日本语大辞典》(讲谈社,1989年)有相关条目,可作参考。“汉学 在我国指以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日本国语大辞典》第3卷第135页。“支那学 以中国的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等为研究对象的学问。18世纪始于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也以京都帝国大学为中心成立了支那学会,在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的指导下,该学会甚为活跃。战后改称中国学。”——同上书第5卷第689页。“汉学 ①以中国清代客观、实证的训诂学为中心的学问;②凡指有关中国的学问。以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为研究对象。”——《日本语大辞典》第417页。

学”主要内容是指对中国的古典和古代文化的研究 其鼎盛期为奈良和平安时代。再接下来的高潮应在江户时期。

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一直具有影响力。这种影响最初是通过朝鲜半岛来实现的。一些在汉学上有造诣的“渡来人”成为传播汉文化的实践者。当时日本的文化中心是奈良。有人对奈良这个地方的文化、风俗和城市建构做过考察，在这里人们发现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而且，奈良这个地名最能说明问题。在朝鲜语中，奈良的意思是“都城”。由此推论，奈良这一日本最古老的都城和日本文化的发源地也许是由“渡来人”给命名的。这一命名在考古学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以奈良、平安时代的律令制为代表，日本的许多制度文化都是仿效中国而来的。从大化革新到德川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政治、社会体制的形成和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多数日本人的行为规范。从日本最早的学校寺子屋到幕末的藩校，所用教材几乎全是中国的古典著作。这个事实是笔者参观存放着旧日藩校资料的长野资料馆时所看到的。

在某种意义上，《论语》、唐诗对日本人而言相当于日本的古典文化。在江户时代，朱子学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被视作国学。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中国思想也影响到了一般民众，中国的古典世界同时也成为日本人的知识宝库。朱子学不仅仅被视作中国哲学，而是被看成一种世界观。以儒学为中心的思辨和做学问的方法成了以后日本人接受兰学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来自中国的概念和方法，日本也无从去接受整个西方文化的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兰学者杉田玄白在《兰学事始》一书中

曾写道：“兰学实际上是在汉学开启民智后出现的。”

但是，由于西洋学说在日本的确立，人们对汉学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与明治维新后较快实现了近代化的日本相比，中国落后了。因此，在日本，轻视中国以及汉学知识的思潮开始出现。汉学和支那学在近代日本的变化，完全可以从日本人对汉语的重视程度上看出来。

在明治以后的日本，人们开始注重学习西方语言，而汉语却受到了冷落。对日本人来说，学习英语、德语、法语等语言主要是为了学习对方的文化。而对汉语仅仅是被作为实用会话来学习的。在当时培养尖子的高中，设有英语、德语等课程，而汉语即使是在第二外语中也榜上无名。

另外，因为战前的“支那”文学研究主要是以日本特有的方式训读中国古典作品，所以学汉语的学生和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大都不会说汉语。其实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学生和学者，在当时，就连一些专门处理与中国有关的外交事务的外交官也不会讲汉语，尽管他们多毕业于日本著名学府，汉语对他们来说远没有英语等西方语言重要。一般来说，在北京和南京的日本外交人员中，擅长讲汉语的大都是下级官僚，身居要职的人几乎都不能讲像样的汉语，他们最多也不过是能讲一些日常用语。为晋升至外交官的高位，学习西方语言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

1871年创立的汉语学所是讲授中国语的正规学校。在这一年，由于《日清修好条约》的缔结，中国和日本初次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同一年设立的还有鲁语学所（学习俄语的学校）。这两所学校主要是为外务省培养翻译人才。两年后两校合并归文部省管辖，改称外国语学所。同年底，又被并入东京外国语

学校。东京外国语学校隶属于文部省，在这里教授的还有未被帝国大学所吸纳的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这所学校并非后来的东京外国语学校（现东京外国语大学）。1880年该校又设置了朝鲜语科，进而成为拥有六种语言的学校。当时一位名叫麦奇·尼克夫的教师在其所著《明治维新回想》（岩波文库）中介绍了该校的情况：学习英语、德语、法语等西欧语言的学生未来一片光明，俄语科的学生与出人头地无缘，汉语科的学生则生源不足。

1885年东京外国语学校停办。由于该校停办，除东京商业学校之外，就再也没有正规教授汉语的学校了。英语、德语被列为帝国大学的大学预备科学习课程，剩下的俄语、汉语、朝鲜语三种语言则被列为东京商业学校第三学部学习课程。

战前的汉语教育有非常强的实用目的，正如竹内好用“商业支那语”、“军队支那语”等用语所表示的那样^①，学习汉语主要是出于商业和军事的需要，也就是说学习汉语和进行中国研究，是为了侵略中国。为了学习汉语，陆军于1879年开始派遣东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生到北京。1881年，陆军士官学校创立，该校设置了汉语科。活跃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翻译大多毕业于该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参谋部刊行了《速成满洲语自修书》。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研究也只是搜集中国情报，为侵略中国服务。安藤彦太郎曾在《汉语与近代日本》中这样描述道：“对于现实中国，学问至上主义不被采用，因为这不是在研究学问，学习汉语只是为侵略中国而已。军队作战所必需

① 竹内好：《关于支那语》，《中国文学》1941年11月第78号。

的《兵要地志》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作。汉语就不用说了，有关中国现实的知识都不是普通学校学习的内容，所以掌握某种特殊技能的人常常作为‘支那通’而大受欢迎。”^①

作为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所奉行的是“脱亚入欧”。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日本人视亚洲为一个整体，并试图“帮助”中国摆脱欧美压迫。当时支那浪人的存在就是一个证明。因此，当时的日本除实用主义的培养精英的正规教育之外，民间也有教授汉语的私塾。

1875年，广部清以促进日清两国友好交流为目的而创设的日清社是讲授汉语的私塾。两年后，受西南战争影响，学生减少，私塾关闭，日清社被振亚社所取代。振亚社是在中国参与间谍活动的兴亚主义者、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创立的亚洲主义团体。这个组织后经改组，与兴亚会、亚细亚协会、东亚同文会合并。兴亚会的中心人物之一宫岛诚一郎过去是幕府大臣，一方面倾心于民权论，一方面热衷于中国问题，他让儿子宫岛大八学习汉语。此后，宫岛大八去中国拜直隶省（现河北省）保定府的莲池书院院长、桐城派学者张廉卿为师。在那里的七年间，他通过汉语学习真正掌握了经学、训诂和书法。

甲午战争之际回国的宫岛大八，于1895年在自己家中开设了中文私塾咏归舍。1898年扩展成为善邻书院，是日本主要的中文教育私塾。宫岛大八的私塾不仅重视实用主义会话教育，而且还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其门生不少就职于

^① 安藤彦太郎：《中国语与近代日本》，岩波书店1988年，第54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筑波大学）、各所陆军学校、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及其他大学，随着他所著述的问答体教科书《急救篇》的普及，他成了日本中文教育方面颇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私塾重视伦理道德的儒教，实行以陶冶人格为中心的教育。

在汉语教育方面，有必要提及做眼药生意的乐善堂。幕末时期在日本传播医学和英国学的詹姆斯·海波恩，为了在日本最先发行英语辞典《和英语林集成》，于 1866 年去上海寻找活字。与他同行的弟子岸田吟香在看到上海流行眼病时，于是考虑制造眼药在中国出售。1877 年他在银座设立乐善堂，紧接着，第二年在上海和汉口相继开设了分店。在中国的乐善堂雇佣学习中文的日本青年，让他们一边经商，一边调查中国各地区情况。后来陆军对乐善堂的成绩给予肯定，并从参谋本部派遣荒尾精少尉到汉口，以监督乐善堂的经营。后来荒尾精以乐善堂为母体，于 1884 年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建所典礼上，他对被选中的 150 名新生说：要“叱咤欧美、雄震东洋”。这所学校培养了不少的翻译，同时也培养了不少军事间谍。

1898 年中国发生戊戌变法，是年，近卫笃麿创立了东亚同文会，并担任该会会长。后来该会与前述兴亚会的后身亚细亚协会合并。东亚同文会继承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停办的日清贸易研究所，于 1901 年在上海开设名为“东亚同文书院”的学校，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也即 1938 年，该校被升格为大学。这就是今爱知大学的前身。东亚同文书院把重点放在中

习上，另外，沿袭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传统，让学生们在毕业前一年走访中国各地，并提交实地调查报告。后来，这些报告

被汇集成《支那经济大全》，被视作是中国社会和经济调查的范本。

2.1 东洋史学和中国调查机构的成立

明治初期的日本，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的历史学也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使命。对于研究历史的学者们来说，他们想通过研究历史，以寻求出日本的发展之路，学者们认为这才是历史学的真正作用。

当时，学校里教授的历史也多是西洋的历史，亚洲史则不在教授之列。而且，在 1877 年 4 月刚刚组建的东京大学，西洋史也是由德国人李斯讲授的。日本的学校之所以不讲述亚洲史，正如已说明的那样，是因为日本人认为亚洲对于日本来说没有任何可借鉴的东西。日本的中国研究——尤其是到明治维新以后——对于现实的中国是不感兴趣的。原因是中国具有辉煌的过去，因而具有研究的价值。但在近代以后，中国落后了，因而也就没有研究的价值了。用福泽谕吉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和朝鲜一样，是日本东方的“恶友”，不但不应与之交往，而且是应予以“回避和谢绝”的。

日本人的中国观虽然很早就转变了，但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却仍然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也就是不知该如何评价中国，他们对现实的中国是轻蔑的，但对古典的中国却是崇敬的。这种困惑可以说是始自明治时代。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通过对朝鲜、中国的侵略逐渐实现了近代化的过程中，渐渐地开始瞧不起中国等亚洲国

家。甲午战争以后，对中国的轻视一下子渗透到了民众当中。

战前，在论及中国时，人们总是要说中国人不讲卫生、头脑顽固和爱撒谎之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情况虽发生了变化，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中有消极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日本人仍没能摆脱对中国的轻视。

但是，日本人的中国观，与对亚洲其他地区的认识是不同的，其中有着另一个复杂的因素。明治以来，日本一方面看不起现实的中国，另一方面对古典世界中的中国甚为尊崇。这种分裂的中国观起因于日本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①

一直以西洋为赶超目标的日本，在近代国家逐渐开始形成并扩大了对西洋认识的同时，日本人萌生了亚洲人的独立意识。另外，也由于甲午战争的爆发，在世界上，亚洲进而也日益受到重视。是这一时代的潮流促成了日本的东洋史学的成立。东洋史学成立的另一个背景是，欧美都在重视“东亚研究”，而要在各方面赶超欧美的日本却不存在这一学科，加之日本又处于东亚，这也是日本不得不建立东洋史学科的一个原因。

东洋史这一用语最初是由那珂通世提出的。那珂通世也是受传到日本的西洋史概念的启发。这里的东洋史是一个特定的

^① 安藤彦太郎：《中国语与近代日本》，岩波书店 1988年，第 50 页。

概念，主要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各国的历史，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相对西洋史而言的。

那珂通世 1886 年开始写《支那通史》，1888 年完成。该书作为教科书来写，目的是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史。那珂通世历史研究中的实证方法论和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停滞性的文明史观，主要是受其老师福泽谕吉的影响的。

那珂通世青年时代为了学习英国历史，于 1872 年进入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学习，后曾在千叶师范学校、千叶女子师范学校、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他因蒙古史研究而扬名，从 1896 年开始兼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

1910 年，东京大学首先设立了东洋史学科。那珂通世作为通晓西洋的亚洲研究的知名学者，在引导东洋学的研究方向上所起的作用也是甚为重要的。

1904 年 7 月，白鸟库吉在《世界》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我国之所以强盛的原因》的文章，其中充分表明了白鸟对亚洲国家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的力量较量是亚洲历史的一条主线。在历史上，北方和南方冲突的结果导致农耕民族的南迁和北方民族的逐渐渗透。但是这种渗透是双向前进的，一个方向是在武力上北方征服了南方，并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农耕民族的统治者，另一个方向是农耕民族以其历史和文化的优势来同化其征服者。由于农耕民族一直拥有这种文化上的优势，因而这就使得农耕民族产生了保守主义，而且这种保守主义也就成了农耕民族战胜游牧民族的武器。伴随着这种被征服的历史的形成，另一个文明上的弊端是，农耕民族逐渐失去了民族认同感和爱国之心。白鸟认为，这正是东亚各国衰败的真正原因。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拥有与此不同的文化取向。白鸟认为，尚勇的精神传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万世一系的皇室的存在，是大和民族区别于亚洲其他民族的地方，同时也是日本强盛的起因。

白鸟的研究也说明了日本“支那学”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强调学问要服务于政治。白鸟称，皇室对于日本来说是起支撑作用的东西，如果没有皇室的支撑，日本这个国家就会不存在，因而皇室之于日本，正如同支柱一样是坚韧而富有实力的。

就日本能不断地吸取外来文化优秀的成分这一点来说，白鸟的观点是，日本之所以能够引进西方的制度和先进的技术文明，是因为日本具备领悟西洋文明的能力，能认识其价值，这一点是亚洲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

白鸟的这篇文章最能体现其思想倾向，他的学术研究所要表达的也就是对日本皇室的忠诚、日本民族的独特以及中国和朝鲜的落后和停滞性。

当时，除了东洋史学之外，日本还有一种学术传统，那就是自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对中国的古典文化进行研究的汉学，但是由于受到来自于政治上的影响，日本的汉学存在着一种在精神和意识形态方面拥护天皇制的倾向。与此相对立，依照西洋史治学方法形成的东洋史学则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的倾向，在学风上，两者是迥然不同的。这种对立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两派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态度和治学方法的差异。汉学超越时间限制，把对古典文化的崇拜与日本天皇制联系起来，起到了助长反动思想的作用。而东洋史学是想站在所谓的近代主义立场上，以实证主义方法从事儒学研究，对中国文化的封建性进行了批判。但是，“无论哪一派，都不想真正理解饱经苦难的近

代中国的现实”。^①

正如竹内好发表的《反省汉学——驳竹内照夫所论》^②中所写的那样，当时的汉学已脱离了现实社会，并且，几乎没有人反省过这种学问的意义。“我认为今日的事态是，作为意识形态而被虚化、被抛弃的汉学，身上背负着太多封建桎梏，置于社会进化之外纹丝不动，变得形同走尸。万恶的根源都在于此。”与汉学本身所包含的封建的、恣意的特质相伴生，汉学被孤立于学术潮流以外。汉学者的一种唯我独尊的自大意识也助长了这种倾向。“不想让他人阅读自己的作品（或者是想而不能），也没有理解他人文章的魄力，抱定独尊态度，缺乏批判精神。”^③

对于日本的中国研究，鲁迅的评价是，就中国研究来说，日本占有世界上最有利的地位，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日本恰恰是世界上最落后的。这是因为日本人一味注重翻译欧美的研究成果。欧美的中国研究看起来似乎精细，但在中国人的眼里，总有一种重心偏离的感觉。而日本又偏偏在追寻这种已经偏离的重心，这是十分错误的。毕竟在世界上只有日本能够对中国的文字、图画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正确的解读。^④

内山完造认为日本人在从事中国研究的态度上大概是中国必须如何如何，或者更露骨一些说就是如何去占领中国。形成

① 安藤彦太郎：《日本人的中国观》，劲草书房 1971年，第 93—94 页。

② 《中国文学月报》1935年10月第8号。

③ 同上。

④ 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社会思想社，第 229—230 页。

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那些研究机关基本上全是受政府和军部的补助的，因此要为他们服务。这种研究忽视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没有触及普通中国人的现实生活。^①

也就是说日本的中国研究对现实的中国有所涉及的话，那也是为了侵略中国和服务于日本的“大陆政策”。这种研究也都是实用的调查和收集资料，其性质与具体客观的学术研究是决然不同的。就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服务而言，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而且一些为世人所熟知的对中国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给予过支持的人士也没有能够摆脱这种心态。曾在中国做过留学生、当过侵略军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城野宏在其《中国学原理》（原书房，1978年）中称宫崎滔天等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因为给予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以援助的日本人所想的是，在孙中山组成新的革命政府后，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将会得到保障。尤其是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一批人士，是日本的“大陆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和倡议者。

在东洋史学成立的同一时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于1908年1月正式组建了“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专门从事对中国的调查研究。“满铁”调查部的研究人员有不少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些对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侵略国策持反感态度的政治学者为了反对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和殖民主义统治，他们在实际调查和研究中所运用的大多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科学中尚没有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有关；他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应用、检验乃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

^① 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社会思想社，第229～230页。

义的分析方法去解读社会现实在当时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威力所在。在日本知识分子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是新颖和切合实际的，而且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和改变现实的理论。

在“满铁”之外，由池田纯久中佐等人组建的东亚研究所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其成立的宗旨是：

为资助帝国的海外发展，东亚研究所以进行关于东亚的人文自然的科学调查为目的。调查事业的内容如下：
(1) 调查的区域范围为满洲、支那、远东地区、北太平洋、南洋、印度、澳大利亚、中亚；(2) 调查必须服务帝国利益；(3) 对各区域的调查是综合性的；(4) 在调查的同时可委托政府和民间机构以及有关人士；(5) 不做调查之外的事业；(6) 本研究所虽然不是国民宣传机构，必要时向国民公布其所应了解的事实；(7) 本研究所愿意接受有关机构馈赠资料和给予指导。^①

尤其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东亚研究所作为向日本政府提供决策建议的智囊集团，在中国各地进行过广泛的调查，为日本军部提供过不少情报。该研究所曾组织翻译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此外还有《三民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山本秀夫)《支那的度量衡》(酒井忠夫)和《新支那中央政权的国际法基础》(田茂二郎)等研究论著。

^① 《东亚研究所报》第 1 期，1938 年 9 月。

东亚研究所虽然是一个向为政府提供有关决策依据的机构，但在研究人员中也不乏进步人士。如伊藤武雄曾任“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部部长和东亚研究所上海所长，但后来成为组建中国研究所的主要成员之一，并任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冈崎嘉太平曾任东亚研究所上海分所调查顾问，但战后为推动中日贸易的开展做了不少工作。小泽正元也曾在东亚研究所的北京分所任职，在战后成为日中友好协会的第一任事务局长。

2.2 内藤湖南的中国观

在 20 世纪初期的汉学者中，内藤湖南是一位不得不提及的大家。内藤湖南出生于一个儒学家庭，成长于其家庭由武士变为农民的巨变中。内藤自幼年起就善写文章，20 岁从秋田师范高等师范科毕业后任小学教员。后来由师范学校校长推荐进京，曾任《日本人》杂志以及《朝日新闻》记者，以后成为京都大学教授。当时，京都帝国大学在中国研究方面可说是独树一帜。与东京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相比，京都帝国大学的中国研究在当时被称为“支那学”，在学术源流上受到了以法国中国学为代表的中国学以及清朝的考证学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较为注重严谨性。内藤湖南由于是记者出身，他始终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他在观察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半期发生巨变的中国之后，写了有关中国的著作。他认为，日本属于中国文明圈，所以日本参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理所当然的。他断言中国的君主制将灭亡、共和制将到来。他把宋代以后的历史划归近代，肯定近代平民的运动。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内藤

湖南是带有相当的轻蔑色彩的。

作为知名的中国专家，内藤湖南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譬如，在“间岛”问题上，内藤湖南曾通过实证的调查研究，改变了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对华政策。当时朝鲜把现在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称为“间岛”，并主张对其拥有所有权。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在将“保护条约”强加于朝鲜的同时，也试图将间岛划归到其势力范围之内。

为了证明“间岛”是朝鲜的领地，日本政府委派内藤湖南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并希望获得能说明问题的相关历史文献。为此，内藤湖南在东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记录，但却没有找到能证明“间岛”是朝鲜领地的材料。这次调查对于内藤湖南来说在学术上的收益显然不小，却让日本政府感到了失望。1909年9月4日，在日本政府与清朝政府签订的《关于间岛的日清协约》中，日本虽然让清政府认可了日本对朝鲜人的不动产的所有权和各种经营权，但不得不承认“间岛”为清朝的领地。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政策的转变，就与内藤湖南的主张有着内在的关联。

内藤著有《支那论》和《新支那论》。他在《支那论》一书中称中国应放弃中国周边的领土，仅保住本土就够了，因为中国人缺乏国民国家的政治能力和造成国民国家的资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是不能漠视英、美对中国的瓜分的。这种蔑视中国人的见解，不仅给史学界以莫大的影响，也说明了内藤的帝国主义的思想。

在《新支那论》一书中，内藤提出了“文化中心移动说”。他认为日本是东洋文化的中心。所以当日本和中国在政治上成